

二十世纪中国掠影

丛书

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的
十个党派

主编 任贵祥

十六大
党派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掠影》丛书

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的
十 个 党 派

主 编 任贵祥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 新登字 001 号

《二十世纪中国掠影》丛书

主编 石仲泉 魏克忠 蒋建农

副主编 朱兴义 张媛 刻敏 月杰

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的十位伟人
YING XIANG ER SHI WEI JUN
GUO DE SHI GE DANG REN

主编 任震川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 插页 8.125 印张 179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224—04014—2/K · 614

定价：12.30 元

前　　言

中国的二十世纪，是由屈辱走向抗争，走向奋斗，走向振兴的世纪。

八国联军的入侵，开始了中国的二十世纪，也加重了中华民族耻辱的印痕；它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灾难——民族危机、殖民地化加深，战乱频仍，经济凋败，民不聊生。中国——走进了二十世纪，也走进了黑暗深渊。但是，中华民族是个永不屈服的民族，中国人民在低沉中奋起，在屈辱下抗争，在绝望中寻找新的希望。于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辛亥年爆发，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寿终正寝。但是，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相继掌权，中国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仍然没有改变任人宰割、被瓜分、被奴役的命运。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改造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于是，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睦，人民的团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行改革

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发展，以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充满希望的新道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矗立在亚洲的东方。

中国的二十世纪，是大动乱、大变革的世纪，也是大翻身、大发展的世纪。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战争不断，思潮纷呈，党派林立，英雄辈出……。

一百年的探索，使我们认识到许多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中国人民获解放，也才能使中华民族走向光明，走向胜利。这是本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明确结论。现在，正值世纪之交，这既是百年之交，也是千年之交。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伟大的一页。面对这千年一遇、千载难逢的时候，回顾本世纪中华民族走过的路程，瞻望未来，我们坚信：为创造二十一世纪的辉煌，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发生的巨大进步和变化，可以说天翻地覆。这里只是撷取几个方面的代表性事件、人物等进行简略地介绍，意在使广大普通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各个方面有一个粗

略轮廓的印象。故名之为《二十世纪中国掠影》。

在本丛书编写过程中，作者参考了有关研究成果，也溶入了新的研究心得。文字力求简明、通俗。每本书中所选择的事件、人物等等，都只能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影响较大的一部分，这不是说其他人物、事件或党派等影响不大，只是由于篇幅限制，不能一一论列。请研究者和读者鉴谅。另外，或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本丛书编写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漏，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石 仲 泉

1996 年 8 月

目 录

前 言	石仲泉
中国共产党旭日东升	(1)
中国国民党由盛到衰	(49)
民主人士的大荟萃——中国民主同盟	(81)
不断追求进步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18)
反专制、争民主的产物——民主建国会	(146)
追求民主政治的民主促进会.....	(163)
农工民主党喋血奋斗.....	(181)
维护海外侨胞利益的中国致公党.....	(209)
为了民主与科学——九三学社.....	(224)
致力于祖国统一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241)
后 记.....	(251)

中国共产党旭日东升



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跨入 20 世纪的门槛时，却依旧是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统治者的内外压迫叠加、中国人民不屈的抗争与痛悔的失败交织。大地苍茫，浮沉谁主？中国共产党旭日东升，喷薄而出。它于历史必然中诞生，苦斗中成熟、发展中壮大，领导和组织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奋斗，中华民族尽雪前耻，昂然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它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中国人民消灭了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历经艰辛曲折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走过 70 余载的辉煌之路，发展成为拥有 5700 多万党员、深刻影响 20 世纪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党。业未穷，路正长。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速奔向 21 世纪，奔向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

在历史的选择中诞生

中国共产党于 1921 年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1840 年，老牌帝国主义——英国，以毒品鸦片作后盾，以大炮为前驱，轰开了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伴随着一次次的被侵略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进入了多灾多难的年代，它犹如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负重蹒跚。当中国人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 20 世纪时，依然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依然是一片悲惨破败，前景黯淡。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的抗争，在近代中国几乎没有间断过，但一次又一次地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把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一场新的

以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又开始了。1911年，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它既没有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辛亥革命的成功，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毕竟不能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行不通的。

历史在继续选择着救中国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的命运，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以最直接的启示：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的路。从此，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且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在中国先进思想界中居于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开始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姿态参加了这一运动，并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在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并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巨大力量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径，先后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自觉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在各地组建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1

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12名代表参加大会，他们代表着来自7个地方的53名党员。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二大，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即把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发动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党的政治影响和在群众中的威望逐渐扩大。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只有与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带着这一收获，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到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中去。

在大革命运动中初显身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充分认识到，要同异常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这一点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教训也得到证明。为了建立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热烈讨论，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会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采取了实际步骤，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扩大其组织。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对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实现后，大革命的洪流开启了闸门，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在卓有成效的发动与领导工农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发展壮大。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达994人，比三大时增加一倍多。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到1926年4月，全国各地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以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发展了党员。

中共四大以后，全国的工农运动继续高涨。随着革命的深入，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激烈，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崛起了以蒋

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老右派毫不犹豫地对共产党发动了一次次进攻。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思想上错误地把资产阶级看成是民主革命的主体，行动上不但不去同蒋介石争夺政权和对军队的领导权，反而助长了蒋介石加强对政权和军队的控制，以软弱退让来“维护”国共合作。于是，蒋介石逐个夺取阵地，把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从而为日后发动反共政变作了重要准备。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战绩惊人：到1926年底，已先后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此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也有可能利用有利形势，直接掌握一部分军队和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的到来。可是，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陈独秀以为共产党人如此“无为”，足可证明自己无夺权之心，蒋介石大可放心，国共合作则不致破裂。但不断加紧对政权和军队控制的蒋介石，并未放松分裂的部署，结果，当他把一切准备就绪而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在实际行动上亦是于横逆到来时无还手之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半个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了批评，但仍然选举他为总书记；大会对蒋介石的叛变痛加诛伐，却又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大会召开于革命紧急关头之际，却对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连谈都没有谈。中共五大未能拿出挽救革命的方案，而局势越来越危急了。一筹莫展的陈独秀等，继续执行退让政策，

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惟恐刺激武汉的汪精卫等国民党人。可悲的是，这一切只是与虎谋皮而已。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正式决议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全面破裂而挥手告别了曾有过的辉煌时代。持续了三年多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转入了低潮。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数量由5万多锐减到1万多。但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在愈挫愈奋中走向成熟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在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领导了9月秋收起义。鉴于反动军队的力量强大，“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起义计划无法实行，毛泽东当即立断，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率部队于10月初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

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井冈山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新方向。

正当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各地武装起义方兴未艾的时候，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下，提出了一套“左”倾的理论和政策，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形成城乡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这一“左”倾政策的贯彻执行，导致在一些地区发生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了群众，并且盲目发动的农村武装暴动和城市起义也大多很快被镇压下去。由于工农革命军被调往湖南去支援暴动，结果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这一“左”倾错误，集中反映着党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考验面前的急躁冒进情绪。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指示，批评了党内“盲动主义”、“杀烧主义”等“左”倾错误，结束了这一次“左”倾政策的继续执行。

随即，在1928年6月至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转变，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会后，中共六大的精神逐步传达到各地的党组织，实现了党的工作路线的转变。党的组织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群众斗争都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工农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都取得了发展和胜利。尽管党的六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但六大的中共中央对于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也给予了积极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经由中央推广的毛泽东、朱德等关于加强党和红军建设的经验，对其他一些根据地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1929年底，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的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决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随着农村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从而形成了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走向胜利的。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特的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是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对探索这条革命道路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但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主张，却被李立三等人多次以中央名义批评为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193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表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

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加紧推行的结果，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白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被敌人破坏；在苏区，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到很大伤亡。毛泽东、朱德等一些党和红军领导人，在实践中依据实际情况，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等的“左”倾冒险主义计划及其在中央的领导地位，革命工作得以逐步恢复。

可是，没过多久，共产国际的“晴雨表”再次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政策的把握。在共产国际代表的颐指气使下，王明被推到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自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始，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是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视为“右倾”的更“左”的错误路线。此后的几年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一方面大力推行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一方面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口号下，实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排挤持不同意见者，使党在白区工作损失殆尽。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被解除，代之以不明实际的李德、博古的瞎指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作战“十六字诀”被抛弃，代之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堡垒战”。歧途之下，自酿苦酒含泪吞。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只能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向西突围，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其他大